

人民日报海外版专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秘书长陈永杰——

中国银行业暴利 超过烟草石油

在经历去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增速逐步放缓,受到外部出口需求减少和内部通胀压力的影响,实体经济经营出现困难。而与此相反的是,银行业却独善其身,去年利润出现了大幅增长。人民日报海外版记者就相关问题,专访了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秘书长陈永杰。

银行业暴利超烟草石油

问:尽管去年我国经济增长放缓,但是根据几家上市银行最新年报数据显示,2011年净利润均出现同比大幅增长,如此之高的利润,究竟算不算暴利?

陈永杰:去年是中国银行业最赚钱的一年,从已经公布业绩的几家上市银行来看,其利润增长都在40%—50%,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么高。相比之下,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去年前三季度实现利润3.68万亿元,除去个人所得税,人均净利润不过3万元,以此计算,银行的人均净利润是工业企业的12倍。我们都说烟草是最暴利的,石油勘探开采也很暴利,而现在银行业比这两个行业利润还要高。

存贷款利差大喂肥银行

问:银行业利润如此之高的原因是什么?

陈永杰:一是去年整个信贷的基础比较大,虽然增长率没有2010年那么高,但是增长还是很大,那么与之相应的就是银行的规模也大了,所以相应的营业利润就多了。第二个方面也是最基本的因素,就是存贷款利差比较大。这个存贷款利差就是银行主要经营收入,也是利润的主要来源。我们国家的16家上市银行,去年前三个季度的净利差收入超过1.2万亿元,占营业总收入80%。还有一个因素就是银行通过其他的一些业务,比如说通过搞信托、理财来获得利润。去年银行非贷款业务增长得非常快,促其利润增长非常快。

应对银行业暴利征税

问:未来银行业的发展和改革的方向是什么?银行应如何协调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发展?

陈永杰:首先,应该采取存款单边加息与降低存款准备金

率的政策措施。目前我国存款利率是3.5%,贷款利率是6.56%,息差超过3%,远远高于西方国家的平均水平。采取单边加息,就是在贷款利率不动的情况下,提高银行的存款基准利率。而贷款利率不动,就能够减少银行由于利差导致的收入过高和利润过高。利率要提高到多少才合理呢?我们的存款利率应该高于通货膨胀率,至少不低于通货膨胀率。高了,老百姓的存款才能保值,否则都是贬值。同时也可以增加企业存款收入。

其次,国家应当加强对银行业的税收监管,提高银行业的税率,对银行业的暴利进行征税。

第三,要加强对银行的工作人员,特别是中高层人员的个人所得税的监管,防止利用暗的收入进行逃税。

第四,要对国有银行为主,包括其他的一些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经营成本,特别是管理费的支出进行监控,尤其是消费和公关支出的控制。

第五,银行要加强对于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的服务。

第六,逐步实行利率市场化。

第七,大力发展小型金融机构。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对话

周勤: 不承担风险却获超额利润 这是最不合理的



周勤
东南大学
经济学院
副院长

现代快报:对于“银行业暴利超过烟草石油”这样的观点,你怎么看?

周勤:我觉得对“暴利”这个概念先要厘清,不能说人家利润高就是暴利。一个企业利润的高低和其承担的风险是相对应的。中国银行的“暴利问题”在于,它几乎不承担风险就获得这样高的利润,这是不合理的。苹果公司的利润增长是惊人的,它获得如此高的利润合不合理?全世界没有人说不合理,因为苹果是一个创新的企业,这样的利润是创新的结果。然而中国的银行的利润从哪里来?是通过制度的安排、行政管制而提供给它们的。这是本质性的不合理。按道理说,在现代企业中,应该由政府提供保护的企业只有公用事业企业,银行是商业企业,不是提供公共服务的企业,不应该受到政府的保护,而因为它受到政府的保护,特别是法定利差的存在,使得其获得了超额的利润,你不承担风险却获得这么高的利润,这才是“暴利”。

现代快报:民生银行行长洪崎说过,“企业利润那么低,银行利润那么高,所以我们有时候利

润太高了,自己都不好意思公布。”

周勤:这种不承担风险的利润还是太高了。我国总体上还是一个资金比较短缺的国家,而现在来说,由于资本市场的不开放,使得商业银行成为企业最主要的融资来源。现在看到的一些情况还是表象性的,企业中间的灰色地带有多大更难想象。商业银行的要素收入是偏高的,问题是这些企业不承担什么风险。如果你是创新型企业,哪怕你获得1000倍甚至更高的利润那都是可以接受的。然而,你看中国的银行有创新吗?有真正通过创新获得超额利润的吗?没有。讲句难听的,在这样一种情形下,换个能力一般的人去做某个商业银行的行长,即使获得的利润没现在这么高恐怕也低不到哪去。

现代快报:如何从核心上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状况?

周勤:要在金融体制上进行改革,资本市场应该更深更宽地开放。商业银行本身应该是所有金融机构里风险最低、最保守的,其利润应该是相对比较薄的。从宽的角度来说,利息的费率应该有一个“非常宽”的宽度,应该让市场来决定它的市场费率。从深度来说,不能仅仅是商业银行,保险、再贷款、票据等等应该有一个非常有序的市场空间。商业银行只是金融体系中的一个部分,而且应该是低风险低收入的一部分。应该从顶层设计而言,必须要解决这些问题。 快报记者 刘方志

今日视点

邢质斌可以拍广告,“新闻联播”不行

自1995年接拍虚假减肥腰带广告遭消费者普遍声讨之后,央视前著名主持人邢质斌再次身陷广告门,这次,邢质斌为山东潍坊一家食品企业录制了企业版“新闻联播”。

这段名为《××特别报道》的视频,内容完全仿照“新闻联播”的形式,视频中,邢质斌正襟危坐,播报了“该企业举办新春年会、该企业董事长向全国消费者和经销商拜年”等三条所谓的新闻,其中最雷人的是第二条——邢质斌严肃地播报了自己为该企业的代言消息:“央视著名播音员邢质斌同志正式签约,为××食品企业形象代言,并为××企业录制《××特别报道》节目。”(2月1日《山东商报》)

一家门户网站在转载这条新闻时做了个调查——“你如何看待前新闻联播主持人接拍广告”,结果是,超过55%的受访者都认为邢质斌在退休后有选择个人生活的权利,接拍广告无可厚非。网友们的宽容令人欣慰,毕竟这是一个私权利彰显的时代,邢质斌虽曾为“国脸”,但她退休后自有接拍广告的权利,只要广告不违法,没有虚假代言,就无可厚非。但邢质斌可以拍广告,“新闻联播”却不能拍。作为国家电视台一档最具影响力的新闻节目,代表国家发声的“新闻联播”应该远离商业利益,这是社会共识,也是底线,企业版“新闻联播”,却消解了这一共识,突破了这一底线。

这则精心设计的广告,要达到企业设想的效果,没有邢质斌不行,没有山寨“新闻联播”的广告形式,更不行。事实上,邢质斌之前接拍的一则妇科医院广告,也山寨了“新闻联播”。这足以说明,在广告客户眼里,山寨“新闻联播”的广告形式,与请到前“国脸”邢质斌同等重要。简单来说,这些广告,都是借“新闻联播”的影响力造势和谋利。

作为国家电视台最有影响力的新闻节目,“新闻联播”的特殊性和重要性无需多说,某种程度上说,它是政府提供给整个社会的公共产品,具有鲜明的公益色彩,谁也无权拿它为商业利益背书。即如一些发达国家,在机场、地铁等公共场所,最具眼球

效应的位置上,不是铺天盖地的商业广告,而是教你紧急情况下如何逃生等公益广告。

任何一个社会,总要有一些商业利益无法渗入的领域,在这些领域,不是靠钱说话,而是公益为先。即如“新闻联播”这样的公共产品,就不能被任何商业利益侵蚀。作为前“国脸”,邢质斌当然可以拍广告,但前提是不要把“新闻联播”与广告捆绑在一起,企业当然也可以请邢质斌代言,但前提是借“新闻联播”谋利。怪异的企业版“新闻联播”,暗喻商业利益的无所不能,突破了公共产品远离商业利益的底线,央视和广告监管部门不能坐视不管。

(本报评论员 赵勇)

中国观察之樗梓专栏

县政府给自己放假就是集体渎职

初七开工后,许多机关单位却依旧在放假。先看看云南网2月1日的报道:一些去云南泸西县政府机关办事的群众反映,年初七那天,各机关纷纷放了“开门炮”,却不见正式上班迹象。县政府机关值班人员称,要到正月十五以后才收假。泸西县下辖的乡镇政府的甚至要2月16日才收假。据悉,提前放假,节后推迟上班,在当地已成为“传统”。县政府的门卫更是说,现在“政府放假了”,要办事得等上好几天。

要说“传统”,这显然不是泸西县的专利。同一日,有《三秦都市报》报道,节后上班第三天,陕西大荔县政府大厅上演“空城计”,三个便民窗口仅一人值班。

1月31日,湖北新闻网报道,武汉市治庸办对市农业局暗访调查,发现该局部分公务员节后上班第一天,脱岗拜年。笔者本人春节前在安徽老家也遇到过类似情况:许多县乡一级的机关单位,在春节前几天就已经放假了,许多外出务工人员回老家办事根本找不着人。

这种事吊诡之处在于,它不仅不是个别现象,而且居然成为多年的“传统”,却无人监管。个中原因大概是,一些主要领导也在享受这种“传统”,就像“三公消费”一样,它已然成为机关单位特权的一部分,或者说是通行的潜规则。

都知道特权是个好东西,在

过节这件事情上,我们发现它还有一个神奇功能,便是治疗节后综合征。长假后上班之初,许多人都有一种厌倦与焦虑的情绪,可那些机关享受延长假期的地方,公务员就不存在这种情况,因为他们的假期本来就比普通入长。“政府放假了”,老百姓去政府机关办事,就办不成,反而要浪费时间,白跑一趟甚至几趟。这样集体脱岗的政府机关,哪还有丝毫的服务意识,哪还有丝毫的公仆概念?

不得不说,政府擅自延长法定假期、扩大自身福利待遇,是一种集体性的渎职与腐败行为。负有法定职责的国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擅离职守,影响国家

与群众的利益,便是最基本的渎职行为。个人渎职,应该严惩,集体性的渎职,也应该严惩决策人,不能让集体渎职成为责任追究的避风港。

愈演愈烈的福利腐败,已到了非治不可的地步了。它伤害的不仅是法律权威,而且会扰乱企业与群众的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除了寄望于纪检机关的铁腕治理,我也希望一些利益受损害的民众向法院起诉那些玩忽职守的政府机关。胜算如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此举表达自己的不满,让这些丑闻不会那么容易稀里糊涂地被糊弄过去。

(作者系资深时事评论员)

公民发言

若批评不自由 则三亚道歉无意义

持续了多日的“三亚宰客事件”依然余音难了:三亚市委市政府于2月1日上午举行媒体见面会,三亚市委书记姜斯宪就游客反映的“宰客”现象向大家致歉。与此同时,却有三亚官员表示,“对三亚恶意攻击的人,将依法追究。”

市委书记道歉的积极意义,被一句杀气腾腾的“恶意攻击”消除殆尽。果真有游客对三亚恶意攻击吗?这些年来,关于三亚宰客的投诉并不鲜见,就连三亚市旅游局副局长唐嗣锐也说,他有朋友在三亚消费时被宰过。更何况,游客的投诉多是为了解决问题和改善现状,怎能说是“恶意攻击”呢。

莫非只要说三亚旅游有问题,就是“恶意攻击”?况且,评价服务之优劣,不正是消费者的基本权利吗,谈何“依法追究”?

身处“宰客危机”中,三亚政府部门是反躬自省、举一反三,还是抛出所谓的“零投诉”和“恶意攻击”,足以说明它是否真正意识到了问题所在,是否有诚意和能力去解决问题。直面网友的群情激愤,最好的办法不是“努力”关闭网友的发言渠道,而是让他们畅所欲言,多方面发现不足,切实改善三亚的旅游环境。

在无人负责的“零投诉”谎言和所谓的“恶意攻击”论之后,再来看三亚方面的道歉,它不免让人有些失望。道歉就是为了表达心中的愧疚,表明可以被预期的改过举动——现在一边是承认宰客等旅游乱象的存在,另一边是少数官员不惮于说出的“追究恶意攻击者”,无论如何,这都不是一种能够被预期的道歉。若批评不自由,则道歉无意义。

对待批评,最好的办法从来都是“宜疏不宜堵”,面对宰客批评,面对难堪的丑闻,管理者能不能真正反躬自省,能不能放弃动辄捂盖子的思维,是三亚旅游环境能否改善的关键,也是权力如何对待批评的一次检验。(王聃)